

规训的身体、符号的身体、资本的身体

——当代女性身体的哲学话语的三个侧面

董金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经济与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430062)

[摘要] 人类的身体,尤其是当代女性的身体,早已不是那个纯粹的自然性的存在物,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身体就是一种镌刻在肉身之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体现。对附着在女性身体之上社会关系的魔咒的祛魅,必须依赖于对之进行深入的哲学考察。这种哲学考察并非是一层面的,而是同时蕴含在三个侧面之中,即从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的身体,以及随之而生产的肉身政治学;以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而重新构建的具有消费性质的身体,最后,在经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女性身体已经转为一种与货币等量齐观的资本,而在女性趋之若鹜追求身体塑形的身体拜物教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揭露过的资本拜物教。

[关键词] 女性; 身体; 规训; 符号; 资本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6]09-0056-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6.09.007

正如玛丽·道格拉斯的那句名言,“身体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个人经验与外在世界的沟通渠道”^①和货币一样,当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之物,在一定程度上,它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倒置为女性身体的呈现,如果说,货币和资本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的话,那么身体,这个特殊的物,也蕴含了当代社会中性别关系,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以女性身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亟需对女性身体哲学,尤其其中所蕴含的颠倒的社会关系进行详细的剖析。从总体来看,女性身体包括可见性的规训、符号化的呈现以及资本化的运作三个不同的侧面。

一、规训的身体:可见性与肉身政治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是一种自然的产物吗?肯定不是,从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开始,身体就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物,那种脱离具体历史,脱离现实社会实践的身体根本不存在,我们或许只有在人猿泰山和狼孩那里才能去设想一个更为自然的身体。恰恰相反,我们的身体是典型的社会性的产物,换句话说,它虽然具有物的外表,但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它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商品,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亦即我们身体是物象化(Versachelichung)的存在,在我们身体中,有意或无意地蕴含了某种社会关系的踪迹,这种社会关系的踪迹,从一开始就如同一个无形的缙继规训和束缚着我们对身体的选择,即社会关系,尤其是性别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我们成长和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中,都具象化为我们的身体性存在。

那么,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塑造女性身体的呢?一种传统的并广受认同的女性主义研究视角是,今天女性身体的具体体现,与以男性为中心构筑的微观权力关系体系有关。在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露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埃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苏珊·鲍尔多

收稿日期:2016-07-01

作者简介:董金平(1976—),女,河北定州人,社会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女性身体哲学和女性社会学。

^①Mary Douglas,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24.

(Susan Bordo) 等人看来,女性身体本身是一种受害的产物,是一种建基在父权制基础上的身体审美体制对女性身体的监控和干预。如鲍尔多指出“社会化的身体出现于并再生产我们文化中标准化的女性实践,这些实践让女性身体变得温顺,服从文化中的要求,同时以权力和控制的形式得到体验。”^①这种研究视角还将当代女性身体塑造技术(如美容手术)同古代的女性缠足作对比,其结论是,这种父权制的身体监控技术,从古至今具有一种连续性,只不过从缠足的迫害最终过渡到对身体直接的裁剪。两者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差异,女性身体在这两种体制之下,无疑都充当了一种被男性目光凝视的牺牲品,从而这种以美为名的监控体制可以合法地伤害女性的身体,让女性身体按照男性欲望的目光来塑造。这样,改变女性身体悲剧性命运的希望在于彻底摧毁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变男性对女性身体凝视的权力关系。

实际上,在这些激进女性主义哲学思潮背后,矗立着一个伟大的身影,这就是法国思想家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在其《事关重大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s*)一书中,对福柯在当代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中的影响推崇备至“在福柯那里,他多次强调身体的物质性,这正是福柯《性史》第一卷最为重要的问题,福柯实际上将性史也视为身体史,而身体就是他们得以塑造的最物质性,也是最生命性的层面。”^②当然,福柯对身体规训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在那里,福柯谈到了规训、监控、权力关系、凝视是如何作用于我们肉身的,他甚至将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于我们肉身的方式称之为肉身政治学(*anatomie-politique*)。不过,仅仅将当代女性身体看成一种社会强制性的塑造与规训,是否真正能够理解女性身体的复杂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必须将现代女性身体的展现与古代的缠足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看待,即仅仅看成一种父权制结构在历史中的延续吗?在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分野中,缠足和现代女性身体的塑形之间本质性的差别被这样一种单一的女性主义身体受难的话语体系彻底掩盖了,而这种逻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建立一种针对于社会的仇恨,并将女性身体的现代展现仅仅看成一种纯负面的产物。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开这个死结,必须回到福柯,这个曾经作为这种女性受难的身体所引用的资源处。在福柯那里,凝视——作为福柯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存在,在观看者和被观看者之间的看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指向,观看者处于看不见的暗处,监视着被观看者,而被观看者处于向视觉敞开的位罝。这样,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在监工与工人之间、在看守与囚犯之间都形成了这种特殊的看的关系。在处于权力一方特定的凝视的范围下,被观看的一方无疑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我们可以从这种凝视或看的权力关系中推导出福柯并没有明言的逻辑:权力者凝视的范围就是其权力的界限。在凝视的范围之内,权力者才拥有监控的权力,而在这个凝视的范围之外,被支配者便不再处于看的监控之下,获得了解脱。那么权力者的权力的大小与他能看到的范围大小构成密切的关系,那么,对于权力者来说,最理想的看,是一种全景全覆盖式的看,一种普世性且毫无遗漏毫无盲点的看。这正是边沁在设计圆形监狱时所谈到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真谛所在,福柯指出“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③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要旨在于,让一个只拥有有限的视野目光的凡夫俗子,通过某种特定的看的技术与构造,拥有了只有上帝才能具有的全景的看。

不过,这种看是有条件的,即看是需要一种光学作为支撑的,换言之,只有存在光源的前提下,观看者才有视野范围的概念存在,而这种视野范围正是让观看者成为权力者的必要条件。在漆黑一片的空间里,产生不了确定的权力关系,因为没有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拥有监控他者的技术。这样,福柯的凝视性的权力关系,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光学性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光源作为社会根本性奠基的情形下,权力关系才能以社会构成奠定下来,可以说,光源赋予了权力者以权力,对光的拥有,被视觉所捕捉到的可见之物,都成为了这种光学之下的权力实施的对象。相反,在光的暗面,也是权力或观看力所不逮之处,成为一种权力的真空,在暗面之下,凡物皆不可见,不可能成为支配者,亦不可能变成被支配者,这种暗面成为一种保持着相对自主的状态。

①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暴亮、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e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33.

③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7页。

借助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分别来审视一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女性身体上的具体态度和策略。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身体是不显露的,女性需要隐去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避开光源。如清代女性服饰“多为宽袖、花缎、大襟、阔边大袄”^①,意味着清末女性绝大多数穿着是一种不贴身的宽松式的服饰,这种服饰除了装饰作用和舒适之外,与后来的服饰相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将女性的身体形态隐藏起来。无论是缠足还是宽襟大袖的清代女性服饰,都体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连同其身体都是处于被遮蔽和隐匿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的隐与传统儒教的礼法观念是一致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与家族尤其与家族的家长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依附性,更直接地说,女性是从属于一个家庭的,妻子是从属于其丈夫的,这样,女性在传统中国礼法社会中,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她只是一个家庭的附属物。另一方面,相对于家族男性成员的公共性,女性成员处于隐秘的地位,这种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靠儒家的礼法制度来维系的,即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隐,是靠礼来维系的。

这种隐的关系,并不是女性身体彻底丧失了光源而成为一种非光学的自由的暗面。恰恰相反,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身体是高度依附性的,亦即女性身体高度依赖于一个人的凝视,即其丈夫或父亲的视觉,在他们的视觉下,女性身体的塑造是私人性的。在这种背景下,女性身体在公共领域中是缺席的,不仅如此,女性的服饰与她们的身体不是衬托关系,而是一种遮掩关系。女性身体的缺席,包括作为三寸金莲肉体的脚的缺席,导致了公共光源下身体审美的对象的彻底的空无,在拉康看来,这种审美对象的空无无论为了对缺席的对象的想象性的补充,而成为“花靴弓履,穷极金翠”^②的意淫式审美。

相对于极度将女性身体纳入私人的隐光学之下的传统社会而言,今天的女性身体的表现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显然,女性身体不再以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态呈现,相反,在今天,女性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性的呈现,无论是在电视电影广告上,还是在大街上行走的时髦女郎,都凸显出来的一个特色是,尽可能地身体的婀娜多姿的形态敞露在公共之下。这是从极度的隐向极度的敞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女性身体不再是私密性的不可见之物,而是曝露于公共光源之下的聚焦点,变成公共性的可见之物。按照福柯的分析,这势必意味着女性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权力监控的对象,变成公共光学之下的女性身体。对于这种转变,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女性地位的进一步奴役或进一步解放。重要的是,在这种特殊的公共光学之下,女性身体的出场是异常的,它并非是一种直接的身体显露。按照鲍德里亚的话说“身体的真实就是媒体对事件进行遮掩的真实,一种‘信息’的真实。当事物变得太真,当它们是直接给出并被脱光裸露,当我们处于一个短路的回路中,这意味着各个事物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③那么,依照鲍德里亚,现代女性身体的问题不是身体离我们太远,而是太近,在公共光学的光源的照射之下,女性身体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过度可见的。在这种公共光学之下,女性身体被曝光了,成为一种彻底的敞露,这种敞露并不是让女性身体获得真实感,相反,这种公共光学之下的过度曝光变成了一种过度的真实,或者一种超真实。这里已经不再是光学之下的权力对女性身体的监控与规训,这里涉及到一个更深刻的逻辑,女性身体的过度出场,这种出场本身让作为个体性的女性身体内爆(implosion)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共光学所营造出来的类似于IMAX荧幕影像的3D身体,一种光学技术与现代肉体技术双重叠加而形成的一个复合物。而对于这样的复合物的分析,福柯的规训与监控的光学已经走向了尽头,我们必须转向一种真正的全景光源,现代社会的女性身体才能被还原为支撑其绚丽多彩的外表的真正的基座。

二、符号的身体:普遍性话语与身体的符号化构建

如果真的如鲍德里亚所说,“身体消失了,散发在部分夸大的物体中。……在意义中,在对性的夸大中,在对裸体的眩晕中,一切旨在废除身体”^④,女性的身体在现代化的光学的高度聚焦和曝光下,已经彻底地被删除,消失了,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女性身体又是什么?如果说,女性身体变成了一种超真实的拟像,那么

①孙彦贞《清代女性服饰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②袁褰《枫窗小牋》,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页。

③Jean Baudrillard, *Password*, London: Verso, 2011, p. 28.

④让·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女性肉身的实质性存在也变成了这种拟像的附属物了吗?鲍德里亚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此类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鲍德里亚的分析中得出的是,他所说的身体的消失,并不是说女性不再以肉身存在的方式,而是以拟像存在的方式而存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从来不涉及实质性,而是一种意义关系,这种意义关系所指向的并非一种实质性的女性身体的消失,而是作为个体性的女性身体的消失,作为女性依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塑造的身体的消失。相反,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即便这种呈现是以肉身化的方式呈现,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体的语法体系,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夸大的物体”。这种普遍性的身体语法体系,正是构成当代公共光学之下的女性身体与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所在。

在拉康的《讲座 XVII: 精神分析的背面》(*Le Séminaire 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中,拉康详尽分析了四种话语体系。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普遍性话语,普遍性话语是从主人话语发展而来的,而且与现代社会是相应的。在主人话语中,主人根据自己的权力而对奴隶进行限制和阉割,让奴隶可以依照主人的要求做到适应性的塑造,让奴隶变成\$ (拉康所谓的被阉割的主体)。奴隶的这种塑造针对的是主人的个别性,其适应性的部分和被阉割的部分带有浓厚的主人的色彩,也就是说,奴隶具有对主人的高度依附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身体的塑形与一家之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需要观主人而行事。主人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女性身体,并成为女性身体塑形的标准。但是,普遍性话语尽管也存在着对奴隶的阉割塑形,但是作为明确的主人却从主导性的地位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系列的标准和知识,“这种知识成为了一种唯一性的衡量标准,他对我们的世界作出了祛魅的处理,这种祛魅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科学知识将只有符合它标准的作为正确的言说。总而言之,现代科学将自己转为一种普遍性话语,并将这种话语沁入到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并成功地将整个社会合理化。”^①

这样,在普遍性话语的时代,主人话语不再作为一种实际性的力量成为女性身体的统治,相反,现代社会为女性营造的是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美的科学。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身体在一种全面折磨之中,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美学’目标来进行监护……的危险物品,我们只要把眼睛紧盯着《浪潮》中那些瘦削……的模特们,就可以从中解读出丰盛社会对于其身体必胜主义的完全反向的侵略,和对于其所有自身原则的强烈否定。”^②用当代结构主义哲学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和科学性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这种话语构型是符号性的,它通过符号关系的不断重组,从而构成一种带有科学威慑力的符号权力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从脸蛋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这种普遍性话语之下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规则体系。譬如,对于脸型来说,美容机构就以一种带有科学性的话语的口吻塑造了一种女性美的鸡蛋型脸型的分析,从而可以看出,科学的话语构型是如何以抽象的方式来塑造具体的女性身体的:

我们国家现代女性的平均脸长是 182~186 毫米,脸宽是以两边颧骨之间最宽部位为测量基准是 129~136 毫米。脸型整体均衡的人把脸长分为三等分时,从额头的上部开始到眉毛之间的距离和眉毛开始到鼻尖的距离和鼻尖开始到下巴的距离是一样的。鼻尖到下巴的距离以嘴为界限上下距离一样时最好看。^③

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普遍性话语的审美知识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1) 以量化的指标来评价,这是拉康所谈及的普遍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数量关系将这种知识进一步抽象化,变成一种在话语范式上不可动摇的科学权威性。(2) 这种话语更重视一种组合关系,而不是单纯某一个元素的好看与否,如鼻子与下巴的距离,嘴巴与瞳孔之间的距离关系。从根本上说,这种审美知识的奠基就是一种关系的新的联接(*articulation*) 和组合(*composition*) (3) 这种标准体系已经打破了女性身体的个体性,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标准对于女性身体的个体的规训问题,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现代机制之下,形成一种共通的身体,一种去个体化的身体。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回到鲍德里亚的“夸大的物体”,即那个由于公共光源与女性身体过近,最终导致身体意义内爆,并过度曝光的身体的内涵所在。同样,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谈到了面孔的消失的问题,即在传统的总体文化中,身体与面孔是无区分的,而在“意义文化中(身体在意义中离奇地变得可见,变成一个称作欲望的魔鬼的符号) 身体与面孔有区别——然后是黄色淫秽中海淫的身体的彻底胜利,直至面

① 蓝江,《从主人话语到普遍性话语》,《世界哲学》2011年第5期。

②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 《完美的脸型刀下出》, <http://lady.163.com/lady2003/editor/health/050331.html>。

孔的消失。”^①面孔的消失是在公共光学的强光源照射下,对个体性符号的彻底消除,在面孔消失之后,剩下的就是一堆按照普遍性话语逻辑建立起来的身体。实质上,在美容机构的手术台上,所完成的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面孔消失的过程,如果我们将整个美容机构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美丽生产的装置或机器,任何由差异的、殊相的身体进入到这个装置之后,变成了标准化的流水生产线。在这个机器之下,个体的面孔已经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身体的各个元素的标准及其相互关系。整个美容机构的的行事模式就是将普遍性话语的语法铭刻在每一个经由机器的身体上,让每一个通过机器的身体都变成现代公共光学之下的高度曝光的无面孔的普遍性的身体。当然,在整个现代社会中,不止美容机构单独承担这种身体生产的任务,包括各种化妆品生产商、销售商,服装设计师,美发机构,医院等都是这个庞大机器的一部分。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在广告中呈现出来的是面孔或身材的圣者,她们形成标准的模板,而在大街上行走的女性,变成了她们模板的崇拜者,并接受着这种模板的洗礼。我们看不到个体面对这种模式的独特性,看到的更多是美的千篇一律,一种普遍性话语及其机制所生产出来的产物。

由此,我们才理解了鲍德里亚“夸大的物体”,即一种在现代机制下所产生的去面庞化的身体的凝聚与联合,每一个体的身体,在现代公共光学之下,被整合为一个大写的物(Object),一个公共性的身体,而每一个体的具象化的身体不过是这个“夸大的物体”的分有。现代普遍性话语通过各种美容机构、美发机构、医院将绝大部分女性的身体变成了一种联接(articulation),身体与身体的固有疆界被打破了,剩下只有曝光在普遍性话语之下的“身体一般”,一种被现代资本所锻造出来的奇特的怪异的产物。因此,真正促使女性身体以一种“身体一般”出场的光源终于露出了它的痕迹,即资本之光普照下的女性身体的献祭。

三、资本的身体:女性身体的政治经济学

一旦出现了普照之光下映射出的“身体一般”,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福柯的规训的身体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的身体,在这里都会捉襟见肘。因为在这里女性身体无论呈现出多么绚丽的文化和符号学的斑斓,最终抵不过她沉淀在一个最基本的底盘上,这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已经不能仅仅看到一个身体,或者作为高度符号化的女性身体,纯粹是一个文化性的存在,在更深刻的地方,它掩盖着蕴含于其中的当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换句话说,女性身体本身就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通过鲍德里亚所形容的符号化,女性身体可以被直接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生产体系中来,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到最经典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那里寻找思考当代女性身体的物象化的根源。

或许可以这样来思考,当代美容手术或者女性身体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出于或主要不是出自于审美上的价值(尽管它是以美的形式出现的),在福柯意义上标准化的身体规训也产生了另一部分价值,即在某种意义上,女性身体是可以纳入到交换之中,尽管我们不能将这种交换纯粹理解为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象征符号交换,在《论诱惑》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女性身体作为一种直接的象征交换的在场,在其中,这成为了“男人之间分享资本的淫秽真理,由此产生了广告的放荡意味……交换的人文主义道德之下掩藏的资本深深的欲望,价值规律令人眩晕的欲望。广告试图抓住的正是这种经济之内和之外的同谋关系,它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政治直觉”^②。尽管鲍德里亚试图论证的是资本与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再在象征交换中,在发达的拟像社会中起效,但是他的论证实际上也反证了资本一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欲,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在起作用,正如张异宾教授指出的,鲍德里亚其实想说的是“真正的赢家是资本最深层的操纵。资本在这里玩了一个模糊的游戏,它几乎‘摘掉了面具’,它让你看到了传统阴凹处遮蔽起来的等价法则,即商品价值的等价交换,但这个等价法则的出现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可信性’,一种来自于已经死亡的经济范畴的可信性,这是一种重构式的拟真中的想象性支撑,这种想象中的经济关系支撑了和建构了现实,却遮蔽了今天属于象征范畴的‘资本主义秩序同一性的信

^①让·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②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条’”^①。也即是说,尽管鲍德里亚的思想中存在着将一种“想象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同—性”颠倒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的根基,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同一性或一般性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商品交换和生产中催生的,是来自于现实交换行为中的“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索恩-雷特尔所说“现实抽象,虽然不过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的,但它却并不是源自思维的。它直接的是一种社会本性,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换的时空领域之中。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产生了这一抽象。”^②同样,对女性身体的当代表象的理解,对于女性身体的现代刻画,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抽象的符号层面,那个被符号化的“身体一般”实质上依赖于一个更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层面。

不过,当我们说女性身体是一种资本的身体的时候,同时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

(1) 首先,资本的身体,或者更完整的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女性的“身体一般”是一种资本化的身体生产机制。“资本之下的身体的生产机制,由于其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把一切个体,甚至是最保守个体的身体都卷入到身体的生产机制中来。它的普遍美学的公共光源的照射,是用来摧毁一切身体万里长城,征服最自然身体的重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普遍性的身体生产,在资本的催生下,将女性身体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资本全球扩张的东西,即女性身体本身成为了资本直接作用的对象。”^③不过,这个层面仅仅是女性身体最外层的表象,换句话说,当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普遍性的象征交换成为可能的时候,在拟像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身体被纳入到整个象征交换中,因此资本必然会渗入其中。资本的渗入,其目的当然主要不是为了女性变得更美,而是贪婪的资本从一开始就从女性身体的塑造和标准化的流水线中嗅到了铜臭的味道,也即是说,在当代拟像化和标准化的女性身体生产中,资本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然而,一旦资本介入其中,美容产业就已经不能纯粹从身体美学和符号学来思考问题了,因为资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可以与货币一般等量的“身体一般”,这种“身体一般”可以直接换算成为一种货币的语言,比如在美容医院里,女性胸部的大小、脸颊的圆润、皮肤的光滑,已经被当代美容医学计量化,这种计量化可以完全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坐标中找到其对应物,一个G-cup的胸部当然具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在资本的运作中,G-cup无论在符号政治经济学化的美感中,还是在美容医学的操作中,都是一种价值的对应物。于是,在严格的身体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坐标系中,每一种标准化的身体美,实际上都在美容医学中形成了与价值的映射关系,简言之,这种标准化的美是在货币一般基础上运算的,一般化的货币越多,所获得的身体一般(作为标准化的美的量)也就越多。甚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自然美的女性身体概念也丧失了,因为纯自然的美,由于这个现实抽象的女性身体的价值坐标系的存在,也被强行量化。人们可以谈论的是,这个身体由于自然的因素,可以在美容医学的价值换算中,可以省去多少钱,而不是作为身体自然美的优势。我们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由于身体的资本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下的女性身体生产实际上将女性身体上的一切质的差别转化为量的差别,在两个女性身体之间,存在的不再是美貌的性质上的差异,而是可以直接换算为货币的量的差异,一个自然的美的身体,与一个美容手术制造出来的身体的差别,至少在表象上,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差别,而真正居于其中的性质差别,被深深地掩盖在当代美容医学话语和符号、身体一般或者最直接的东西——货币一般——之下。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过的G-W-G'的公式在当代美容手术和女性身体的塑造上复活了,在G'(被生产出来的身体)与G(进入生产环节之前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量的差异,这个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货币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语言来解读的,而这个差异,也正是资本为什么对女性身体生产和美容产业趋之若鹜的根源所在,因为,女性身体一旦成为资本生产的产品,成为资本刀俎上的鱼肉,其中G'-G差额部分成为了资本施展其巫术最得心应手的地方。相反,我们在具体女性身体上,在一个新生的被资本严重渗透的美容产业领域中,越来越趋于一致和相同,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到,资本所生产的再也不是一个或几个单独的个体身体,而是普遍化和一般化的无面孔的“身体一般”,而“身体一般”正是资本在美容手术、健身机构、化妆品、美容器材等领域中如鱼得水的奥秘所在。

(2) 实质上,在资本对女性身体的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式的逻辑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含义,即当女性身体作为身体一般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坐标系中的时候,身体一般和货币一般一样,它

^①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1页。

^②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③董金平《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通货而存在。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身体不仅仅是自然的,或者美感的,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可以在价值上衡量的产品,它不仅可以被生产,而且可以被交换。在生产领域中,它是资本在美容产业等女性身体生产领域中获利的秘密,但在交换和消费领域,女性身体已经具有了另一种神秘色彩,即女性身体由于可以量化,在当代符号化和象征化的交换中,女性身体成为了一种获利的手段。今天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样的逻辑,即好看的脸比不好看的脸拥有更多的价值,而好看的脸或完美的身体,可以在符号的象征交换中,为拥有美丽脸庞和完美身材的主体赢得更多的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们不用质疑当代许多年轻女性进入美容机构,不断瘦身减肥、练瑜伽的理由,很简单,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未来择偶就业、甚至在事业上成功,都与自己的脸和身体直接相关,简单地说,良好的身体一般,将在象征交换和商品交换的市场上,赢得更多的价值和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再是资本所操纵的一个被动的产品,我们可以说,女性身体本身就成为一个资本,这个资本是可以投资并获得回报的。当女性趋之若鹜走向美容机构,健身减肥,涂抹化妆品,甚至厌食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身体上的资本投入,一旦具有了良好的资本,她的身体便可以为她带来更多的益处。这是一种在当代社会的女性之中十分流行的身体拜物教,而在这个身体拜物教的背后,实质上支持的仍然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资本拜物教,当没有足够金钱和货币作为资本的女性,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之下,很敏锐地观察到,她们的身体本身是可以与货币一般等值的,可以同样经过换算成为一种在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时,对身体的改造和重塑,就是一种资本化的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拜物教就是资本拜物教。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仍然在社会中运行有效,这种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和身体拜物教就永远不会停歇,它们会如同一个越来越庞大而无法停下来、一直向着资本贪婪的深渊前进的机器,在欲望最深层的领域中,女性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体献祭为资本的物神。

当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大声呼喊“医生不就是肉体的教士吗?”^①时,他已经很敏锐地看到,医生或者临床医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核心价值。同样,在当代女性美容手术和女性身体再塑造的大跃进式的潮流中,美容医学也毫不犹豫地担当了将女性身体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急先锋的角色。这是一种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框架中,现代以帝国为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可以供他吸纳的外部来做“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只能从内部的再生产中进行实质吸纳,在实质吸纳中,“社会财富正日益呈现出非物质形态,它包括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相应来说,社会劳动力愈加地非物质化,它同时在直接地生产和再生产各方面的社会生活。”^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帝国式资本主义,或者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将女性身体变成了资本的实质吸纳的一部分,而女性身体本身成为了这个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里,女性身体本身业已成为资本那高高在上的圣殿,而这个看似金碧辉煌的圣殿,是用数不尽的货币和资本,以及无数被掩盖了真实面容的女性的身体一般建造起来的,在冥冥中,圣殿门廊上铭刻着鎏金的铭文——“资本至高无上”。这样,资本通过种种魔术,将最现实的关系,最原本的身体的物性,都转为它的神妙莫测的统治性力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下,女性身体再也不是普通的自然的凡俗身体,甚至也不是美学的身体,而是在资本圣殿之下的为资本宗教献祭的身体,她的身体在被资本所穿透的美容产业的链条中被彻底转化为无脸的不分彼此的身体一般,一旦成为了这种身体一般,女性身体就被作为奉献给资本的最美味的燔祭。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